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接替杰尔查文的人

1811年，普希金考进了皇村学校。这是一所设在皇宫翼宫的学校。

普希金在这所学校已经开始了写诗，但是他的诗才并没有引起教员和学监们的注意。在一个学年结束的时候，教员给他写了下面一个学行考语：“他有着华而不实的才能，和激情与纤细的但又并不深沉的智慧。……他仅是长于那些不费脑力的功课，因此他的进步就很小……非常不用功……机智是有的，但可惜只用于空谈……生性浮躁。”实际教员们并没有看出这个有才华、有个性的青年。他并不是不用功，而是把精力用在写诗上了；他不是浮躁，而是充满着感情，这时他已经在学校手抄的刊物上发表诗作了。

他的第一篇公开刊印出来的诗，是1814年的《致友人》，发表在《欧罗巴导报》上，大概是写给他皇村学校的同学——浪漫主义诗人丘赫尔柏凯的。在这首诗里，他认定诗歌是自己一生的主要事业：“我的命运已经决定，告诉你，我选择了七弦琴。”在1814年写的《小城》一诗中，普希金列举了许多他心爱的作家的名字。一个15岁的小孩子这么博学，使得每个人都很惊奇。这些作家有荷马、维吉尔、贺拉斯、莫里哀、拉辛、伏尔泰、卢梭、克雷洛夫、卡拉姆辛、冯维辛和杰尔查文。

学校的校长玛林诺夫斯基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外交家、作家及学者；俄罗斯文学和拉丁文学的教师加里奇，也有很多著述；逻辑学、心理学教师库尼曾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们都给普希金以很深的影响。所以后来在这两位老师因为在课堂上宣传自由而被撤职的时候，普希金曾写诗献给他们：

把我们的的心灵和美酒献给库尼曾，
他创造了我们，培养了我们的热情，
他给我们奠定了基础，
他燃起了纯洁的明灯。

正是在这些进步教师的影响下，普希金才成了学潮的煽动者。由于他与同学们的要求，结果驱逐了一个最不孚众望的学监马尔丁·皮列兹基。

1815年正月8日，皇村学校举行了第一次低年级学生从初级班升到高级班的公开考试。在参加这次考试的贵宾中，就有老前辈诗人杰尔查文。

校长、教师和贵宾们围坐在一个大厅里，考生们一个一个地被召进来，考完以后退出去。一会儿，叫到普希金。普希金不慌不忙地走进大厅，站在离杰尔查文只有两步远的地方。定了神以后，他开始朗诵了他用杰尔查文爱国颂歌体写成的诗歌《皇村回忆》：

……………
莫斯科呀，亲爱的地方，
当青春的岁月刚刚透出了朝霞，
在这里，不知道悲伤，也不知道苦难，
我消磨了金色的无忧无虑的时光，
你曾经看见了我们——我的祖国的敌人，鲜血曾把你染红，火焰曾把你
舐尽！

我没有为你复仇，也没有将生命为你献出，
只不过徒然地在心灵中燃烧着愤怒。

……………
这首诗的朗诵引起了全场人的兴奋。杰尔查文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他

情不自禁地冲出来走到普希金跟前。他多么想吻一吻这个天真的孩子呀！可是，这时羞涩得不知所措的普希金早已跑掉了。

杰尔查文望着跑出去的普希金，赞叹地说：“这就是那将要接替杰尔查文的人！”

杰尔查文对于青年普希金的赞美，透露出一位老诗人老作家对于新生力量的欢迎。文艺不是个人的事业，前辈的文艺家有责任培养文艺事业的后继人。

在谢辽夫家里做客

有一次，果戈理、别尔格（著名诗人、翻译家、记者）和其他几个朋友，到批评家、莫斯科大学教授、科学院院士斯杰潘·彼得罗维奇·谢辽夫家里去做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海阔天空地谈了起来。有时候也提出一些大家感兴趣的问题来研究，只有果戈理不太爱出声。

果戈理有一个毛病，那就是他通常不喜欢听到别人向自己提出问题，特别是不喜欢别人向自己提起关于文学工作和写作的事。可是客人中不知道是谁，明知道果戈理有这个脾气，却仍然忍不住向果戈理提出问题了。他对果戈理说：“您为什么近来无声无息了，一连几个月都没有写出一行字来？”

他的问话惊动了所有在座的人，一切说话的声音都停止了，出现了一段普通的沉默：有人好像屏住呼吸在等待着果戈理的发火，有人在等待着果戈理对此类问题的回避或者是敷衍塞责的回答。可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果戈理这一次并没有恼火，也没有回避，而是忧郁地微笑着转向大家说：“是呀！人弄到了这种地步真是可怕：他要什么样的生活和工作上的舒适环境，就给予他什么。于是他什么也不想干；再不想去工作了！”在座的人听了松了一口气，有的人不住地点头。

接着又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等着他继续说下去，果戈理接着说：

“我经历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我旅行在德仁沙诺和阿尔巴诺城之间，那正是一个7月间。在路途中的一个小山岗上，立着一座可怜的小酒馆，在酒馆的一间最大的屋子里摆着一个台球台子，这屋子里经常响着台球声，并且可以听到操用各种语言的谈话。所有的过路人走到这儿都一定要停下来，特别是赶上天热的时候。有一次走到这里，我也歇下来了。那时候我正在写《死魂灵》的第一部，笔记本还常在身上。不知为什么，正当我走进这酒馆来的那一瞬间，我想要写了。所以我就叫人搬来一张小桌子放在角落里，然后拿起笔来摊开稿纸，在滚动的木球声中，在极度的喧嚷声和仆人们的奔驰中，在烟雾里，在窒息的氛围里，我一口气写了整整一章，当时我好像是在一场奇异的梦境里一样。我感觉到这一章是最富美感的一章，我很少带着这样的兴奋写作。可是现在，在我周围的人谁也不敲打，既无烟雾，又不闷热……”说到这里，他把两手一摊叹了一口气。意思是说，现在环境好了，反倒什么也写不出来了。所有在座的人听了他的话，都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

果戈理关于写作的这段谈话，说明了创作中的一个道理，那就是“生活太优裕了，工作反被生活所累了”。历史上，许多伟大的作品，都是作家在艰苦的环境中写出来的，就是证明。孔丘被困乃作《春秋》，屈原遭放逐乃

赋《离骚》，司马迁受了宫刑撰写了《史记》。在外国，杜勃罗留波夫很小就失去了父母，他带着五六个弟妹过着穷困的生活，可是却写了许多天才的论文；而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则都是在牢狱中写出来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文艺创作就不需要有一个好的环境了；而是说，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意志的作家来说，困难的环境是不应该成为创作的阻碍的。相反地，环境越艰苦，越能锻炼人，越能使人在事业上努力作出成绩。

从“猎枪”到“外套”

有一天，俄国作家果戈理听到了官场里发生的一件逸闻：

一个很穷很穷的小官吏非常喜欢打鸟，但是他没有猎枪。为了能够买一支猎枪，他节衣缩食勤恳地劳动：每天除了本职的工作之外，还利用休息时间找些额外的工作来做，挣来的钱都积累起来。他终于积累到二百来个卢布，买了一支很好的猎枪，他高兴极了。可是第一次他坐着小船用这支猎枪出去打猎，猎枪就被茂密的芦苇带到水里去了。于是他就跳下水去捞哇找哇，可是都没有找到。到了晚上回到家，他躺在床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后来，他的朋友们知道了，大家就凑钱又给他买了一支猎枪，他这才病体痊愈。但是一想起丢枪这件事，他就脸上苍白得很，很像是一个死人……

讲述者饶有兴趣地在讲，他只是因为故事新奇容易耸人听闻，才如此卖力的。站在一旁听讲的人也都把它当成了笑话，不时地发出哄哄的笑声。可是果戈理却沉默地站在那里，若有所思地倾听着，在哄然的笑声中，他低下了头。他想：那个小官吏多么可怜呀！费了那么大的劲好不容易买到了一支心爱的猎枪，不幸的事又偏偏落在他的头上……这时候，自己在彼得堡的衙门里服务时所看到的一些印象，一下子浮现在自己的眼前了：自己也曾干过那种小官吏的艰苦工作，同僚们的生活、自己的生活地位，和那个丢了猎枪的小官吏的生活有什么两样呢？把这些生活集中起来，不就是一篇很好的作品吗！他下定了要写一篇小说的决心。

“要写下来！一定要写下来！”心里下着决心的时候，可是又犹豫起来。“猎枪”吗，虽然是心爱的，但不是小官吏们生活的必需品；如果换成“外套”——这一小官吏们生活的必需品，就容易体现穷官吏们的艰苦生活和他们的辛酸遭遇了。想到这里，《外套》这个题目就自然产生了。故事的情节也在头脑里形成了：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一个穷困而又怯懦的小公务员，他每天从早到晚地为上司抄写着公文。他有一件千补百纳的破旧外套，机关里的人因此时常讥笑和挖苦他，“向他头上撒碎纸，说是下雪了”。他把自己破旧的外套拿去叫人修补，但却被人拒绝了。没办法，他只好决计再做一件新的。为此，他含辛茹苦地攒钱，甚至连茶水都不喝，晚上有时候饿着肚子，不点灯；他在街上走路，也“尽可能轻轻地、小心地在石路和砖路上迈步，差不多要用脚尖走，生怕鞋底很快被磨破”。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买了一件新外套，但是就是在得到新外套的这一天，这个新的外套却被抢走了。“外套被劫的消息毕竟震动了许多人，虽然有些官吏甚至对这样的事也不放过嘲笑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机会。大家立刻决定替他募捐……”

果戈理按照上述情节写到这里的时候，便停下了自己的笔。他感到这样

来结束这个故事不够真实，因为他与自己所看到的官场并不一致。因此，他想：尽管原故事里同僚们慷慨地凑钱给小官吏买了一支新猎枪，自己却不能作品里让同僚们为小官吏买一件新外套。因为如果他们有这样善良的心，那么当初为什么不去资助这个小官吏呢？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官场上乐善好施的人也太少了。他这样想着，笔下同僚们慷慨凑钱买新外套的结局也就变成了下面的样子：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只好去求助他的上司“大人物”来帮助，但是那些“大人物”却给他以极其严厉的斥责。最后，他在大风雪中挣扎着回到家里，终于在“大人物”的斥骂声中死去了。

从“猎枪”到“外套”，从凑钱资助到无情斥责的结局的改变，说明了文艺实践中的一条道理：艺术反映生活并不是照搬生活，它需要像果戈理写作《外套》那样，改变生活的原型，对生活进行选择、提炼、集中和概括。

果戈理烧毁书稿

俄罗斯伟大作家果戈理，诞生在波尔塔瓦省索罗康彩镇上一个乌克兰地主的家里。他的父亲瓦西里·阿伐纳西耶维奇·果戈理是一位很有教养而又很有学问的人，他能用俄文和乌克兰文两种文字写诗写戏。果戈理生在这样的家庭里，很小便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也非常喜欢戏剧。他的父亲有一位远亲特罗欣斯基，特罗欣斯基家里有一所规模巨大的藏书室，果戈理在那里读了不少书。在学校里，同学们经常演戏，果戈理有时在舞台上扮演喜剧中的老太太、老头儿，也曾扮演过冯维辛的名剧《纨绔子弟》中的普罗斯塔科娃。1826年，果戈理在涅仁中学毕业后，随着就动身到了彼得堡。在彼得堡，果戈理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

果戈理的写作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他的手稿往往是修改了再修改，有时候推敲稿子直到深夜，有时候他还把写好的稿子拿到各处请人提意见，一直到大家认为是写好了时才去交给出版社。如果大家认为写得不好，他就毅然决然地把书稿烧掉，毫不惋惜。

1829年7月，果戈理出版了一本小书《汉斯·古谢加顿》。这是一本田园诗，诗里描写的是一位青年梦想家：他因为追求朦胧的理想抛开了家中未婚的妻子路易丝，到国外去游历。他幻想着能够看一看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经历一下人世上的风波，见识见识世上奇怪美妙的事物。幻想中的荣耀和幻景吸引他访问了古雅、美丽的希腊，凭吊了雅典的遗迹废墟，之后便对人生产生了失望的情绪。他觉得世上的人们都是冷酷自私虚伪阴险的，是一些“最卑鄙的牲畜”。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回到了家里，和路易丝结了婚。这部作品是用笔名阿洛夫发表的。书籍出版之后，杂志上出现两篇批评的文章，果戈理看了以后，一气之下烧毁了自己的书。

1831年的秋天，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部问世了，1832年又出版了第二部。果戈理的这部书取材于乌克兰的自然、生活、人物、歌谣、传说和历史，转述了各种不同的故事和奇闻逸事。如魔鬼的红裤子、为了金窖而出卖灵魂的人、一个查波罗什人从地狱的魔火中取回内缝图书的帽子的故事等等。情节生动有趣，打开书本，色彩绚烂的令人陶醉的乌克兰的夏天把人们带进一个迷人的境界：夜营的悦耳的歌声此呼彼应，美丽的并肖尔河袒露出它的银色的胸脯，快乐而顽皮的小伙子四处游逛，目光晶莹的美人帕

拉斯卡、甘娜和奥克桑娜们俘虏了年轻的哥萨克们的心；草原上在举行婚礼，歌声和笑声在空中飘荡，可笑的滑稽事情层出不穷——爱争吵的凶悍的赫莱拉是个风骚的胖女人，背信的莎洛哈把她的四个情人藏在麻袋里面，索洛比·契列维克傻里傻气，独眼的村长喜欢追逐女性，喝得醉醺醺的卡列尼克总是找不到自己的家……

据说，当果戈理把这部作品的原稿送到一家承印的印刷厂的时候，引起了工人们的强烈兴趣。有些工人看到书稿里的滑稽情节，憋不住用两手蒙住嘴巴嗤嗤地笑起来。这时候，果戈理感到非常惊奇，他以为是自己的原稿有了什么缺点才引起的，于是便赶紧向印刷工人们道歉。一直到印刷厂的老板向果戈理解释了工人们所以发笑的原因时，他才放了心。如果不是老板早一步来进行解释，书稿也就可能被果戈理放在火里烧掉了。

有一次，果戈理刚刚写好一部反映乌克兰生活的新剧本，于是便去访问当时著名的诗人茹科夫斯基。茹科夫斯基有一个不可改变的习惯，那就是午饭以后必须睡一觉。果戈理不知道他有这个习惯，便利用午饭的休息时间把自己的手稿念给他听，请他指出缺点。可是当果戈理读到一半的时候，诗人茹科夫斯基却默默地打起盹来。过了一会儿，茹科夫斯基睁开了眼，这时果戈理对他说：“你看，华西里·安得烈耶维奇，我本是希望能够听到你对剧本的意见，而您的瞌睡就是一个最好的批评。”说着，就把原稿扔到火炉里烧掉了。

果戈理烧毁书稿，反映了他对待自己创作的严格要求。尽管他的书稿付出了艰辛的巨大劳动，但是一旦他认为是不合格的创作时便毫不犹豫地付之一炬。就是在他逝世前的十多天里，他仍然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把《死魂灵》第二卷一叠厚厚的手稿扔进了壁炉，在沉痛和绝望的情绪中凝视着一张一张烧掉的手稿，慢慢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屠格涅夫和祖国语言

在怀疑的日子里，在对祖国的命运进行痛苦思索的日子里，只有你，啊，伟大、雄壮、正确与自由的俄罗斯语言，是我唯一的支柱与靠山！如果没有你，眼见国内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怎么会不令人绝望呢？但绝对不能相信，这样的语言不是提供给伟大的人民的！

这是俄罗斯著名的小说家伊凡·谢尔盖维奇·屠格涅夫所写的题为《俄罗斯语言》中的一段，它充分地表达了一位伟大作家对待祖国语言的由衷的热爱。但是，就是这样一位热爱祖国语言的作家，却有过一段遭到诬蔑的经历。

屠格涅夫晚年长期侨居国外，但是他的心是永远向着祖国的。在国外期间，他积极写作，用笔描写俄罗斯祖国的历史，用笔赞颂俄罗斯祖国的人民；他时刻关心着祖国命运，每天都要看来自俄罗斯祖国的报纸和刊物。

有一天，他拿过刚来的报纸，突然发现了一条关于自己的消息。消息的内容说：屠格涅夫的某些短篇和中篇小说，最初是用法文和德文写成的，然后才译成了俄文。

看到这里，他脸上立刻显出了怒容，浑身气得打颤，两手气得发抖，然后站起来非常气愤地说：“无耻！无耻！真是无耻！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瞪着眼睛说瞎话。”说完，他把报纸扔在一边，抄起笔来就给他的朋友涅盖洛

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一生从来没有不用俄文发表过一行文字，不然的话，我就不是艺术家，直截了当地是一个败类。怎么可能用外文写作……”

的确，屠格涅夫虽然长期侨居国外，并且通晓数种语言，但是他从未用其他种语言写过哪怕是一篇文章。这一点，使他的一些朋友和批评家都感到惊奇。他认为，用外国文字哪怕是写上一篇文章，那也是对于自己的侮辱。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是酷爱自己的民族语言的。

一部杰作的诞生

1862年6月的一天，俄国民主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了。他被带到彼得罗巴夫斯基监狱里最阴森的阿历克赛半月堡里来。一个年老的狱卒迎上前来，他手里拿着烛台，一只手捏着一串钥匙，似乎是早就在等待着这位新的犯人的到来。

沿着狭长的漆黑的走廊，车尔尼雪夫斯基带着沉重的脚镣，哗啦哗啦向前走着。等走到十一号牢房门口的时候，那位年老的狱卒走上前把牢房的门打开了。这时候，立刻从里面冲出一股霉烂的臭味。里面是一间狭小的石头屋子，又潮湿又寒冷，只有一个小小的方口可以透进一丝微弱的光线。屋子里有一个木制的铺位，一把椅子和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只喝水用的小杯。车尔尼雪夫斯基走进了这个囚室，开始了他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他在这里整整呆了678个白天和黑夜。

警察机关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审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案件。他们企图用威胁和欺骗的方式使他承认自己有罪。可是这位坚强的革命者却没有丝毫的动摇和屈服。他坚定地对审讯官说：“我可以在这里坐到头发灰白，甚至可以坐到死，但是决不承认自己有罪。我是被非法逮捕的。”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已经很有威望，所以审判必须有合适的“罪名”。为此，沙皇警察机关不得不寻找假证人罗织罪名。在这漫长的等待审判的日子里，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了他长篇小说的写作。

有一天，监狱的看守走进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他说：“先生，我有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看守说：“什么任务？”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在我还没有走进这所黑屋子的时候，就已经约好了要为《现代人》编辑部写一部小说，并且已经预支了稿费。我要在这里完成这个任务！”看守严厉地问他：“你的小说什么内容？”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说：“都是些家庭琐事，与政治无关！”看守想了一想说：“可以吧！”得到了看守的允许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开始了小说的写作。

他白天黑夜不停地写，就连绝食斗争的几天也没有停笔。有时候，情节的发展使他激动不已；有时候，人物的命运使他流下泪来。他终于在678个白天黑夜里完成了小说《怎么办？》，这是一部杰作，它热情地描绘了作家理想的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塑造了一群平民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家的形象。主要人物拉赫美托夫，是一个不屈不挠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事业的职业革命家，是当时无数优秀青年学习的榜样。

小说写成以后，很快便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沙皇政府很快便察觉了其中的政治倾向，所以立即予以查禁了。可是小说的影响，却永远留在了广大革命青年的心里。

《怎么办？》对列宁的影响是很大的，列宁对这部杰作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在列宁流放西伯利亚的时候，身边经常携带的作品里就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部作品。后来，列宁写了一部揭露机会主义的政治著作，也采用了《怎么办？》这个书名。列宁认为，《怎么办？》这部杰作自诞生以后强烈地影响了当时的革命青年，影响了自己和自己的哥哥。他说他14岁时读这部书没有读懂，在哥哥被处死刑以后又读这部小说时，才真正懂得了它的深刻内容。“这部小说能使人整个的生命都充满活力”。这部小说明确地指出了：每一个能正确进行思考的和品行端正的人都应该成为革命者；而且，他还指出另外的、更为重要的一点：革命家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行为的原则应该是些什么，他应该怎样去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及用什么方法和手段来使它实现……

可是，这样一部杰作却是在监狱里诞生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有些优秀的文学艺术珍品不一定都是在优裕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有的时候，艰苦的环境、坎坷的遭遇反而使艺术家加深了对于时代和社会的认识，从而使他创造的作品的内容更加深刻了。生活在优裕的环境里，关起门来冥思苦想，反而往往写不出好的作品来，这也是生活中常见的事实。

为什么非要在三月写稿

有一次，一个刊物的编辑到列夫·托尔斯泰家里来约稿。

这位编辑对列夫·托尔斯泰说：“我这次来，想请您能够在三月或者是十月给我们的杂志写一篇稿子！”编辑的话停止了，而托尔斯泰好像要刺透对方心灵似地盯着那位编辑，一直过了很长时间才严肃而又严厉地说：“我不明白！”看上去，他好像是在说：你居然想来骗我这个老头子来了！

编辑感到列夫·托尔斯泰情绪有点不对，便慌忙站起来走到他跟前耐心地说：“不！先生，我们是来请你写稿子的，三月或者是十月……”

列夫·托尔斯泰好像没有听到他的这些话，走到门旁把门打开，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回过头来说：“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要在他有话可说、要在脑子里的东西已经成熟只差把它写到稿纸上的时候，才去写作。我为什么非要在三月或十月给杂志写稿不可呢？我始终不明白这一点。”说完，他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自己的房间。

“我为什么非要在三月或十月给杂志写稿呢？”这一句带有疑问的普通话语，说明了创作必须等到酝酿已经成熟时才能下笔的道理。文艺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它是需要经过深入生活反复酝酿才能成功的。酝酿犹如十月怀胎，写出作品犹如一朝分娩。酝酿还没有成熟，那就像胎儿还没有足月一样，勉强生下来也不会健康，甚至可能短命夭亡。只有酝酿成熟，写出的作品才可能成功。不管作家是否酝酿成熟，硬要他在某一时间拿出作品来的作法，是违背创作规律的。

她严格地要求真实

有一次，马克西姆·高尔基与列夫·托尔斯泰在一条路上散步。托尔斯泰迈着仿佛是年轻人的轻快的步子，一边走着一边谈着。他向高尔基回忆起自己在莫斯科苏哈列夫塔附近见到的一件事情：

在一条冷清的小街上，一个喝醉了酒的女人在那里躺着，她已经昏睡得不省人事了。这时候，从一个人家的院子里流出来一道污水，正好从她的后脖颈和脊背下面流过。那个女人躺在这样又冷又脏的污水里，口里喃喃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后来，她渐渐地苏醒过来了，挪动着身子，在那又湿又脏的泥地上挣扎着。可是她终于还是没有爬起来。坐在路旁绿石头上的一个金色头发的灰眼睛的小女孩，泪珠沿着小脸儿唰唰地流下来。她一边吸着鼻涕一边哭泣着说：“妈妈，妈妈，妈……你快站起来！”可是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小女孩带着疲倦而又绝望的神情拉了拉她的胳膊，只见那个醉女人喉咙里发出了一阵响声。她抬起了头，但是很快又倒下去了，后脑袋陷在污泥里面……

托尔斯泰讲到这里的时候说：

“我本来想去帮助她站起来，可是我不能够。”

“为什么不能呢？”高尔基问。

“因为她太讨厌了，她是那样的黏湿滑腻；人若是挨到她，恐怕过了一个月还不能够把手洗得干净。”托尔斯泰回答。他说着向四外望了望，接着对高尔基说：“是的，是的，叫人害怕！您见过很多喝醉酒的女人吧？很多，啊！我的上帝！你不要描写这个，这是不应当写出来的！”

“为什么呢？”高尔基问。

托尔斯泰望着高尔基的眼睛，带着思索的神情慢慢地说：

“我也不知道。我这样觉得……不好意思写丑恶的事情。然而，为什么不写呢？什么都写，什么事情都应当写……”说着，他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他用手帕拭了拭脸上的泪水。可是当他把手帕从脸上拿下来的时候，眼泪又从脸颊上流了下来。他对高尔基说：“我哭了，我是一个老年人了，我每逢想起什么可怕的事情，我的心就紧了。”

高尔基一声不响地在听着。不一会儿，他用胳膊轻轻地推了高尔基一下说：“您也会是这样，将来您活到老年的时候，一切都会照旧不变，那个时候您也会哭，而且比我哭得更多，像乡下女人所说的，眼泪‘流得像小河一样’。……然而什么都应当写，全写出来，否则那个金色头发的小孩会怨恨我们、责备我们的。‘这不是真的，这不全是真的’，她会这样说。她严格地要求真实。”

说完，他要求高尔基给他讲起故事来。

“什么都应当写，全写出来”，这是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思想。他要求艺术家要面对现实，真实地全面地反映现实。因为不真实，人民是会来责备的，而人民是严格地要求真实的。真实不是自然主义的，所以托尔斯泰又反对描写那些世界上不堪入目的龌龊的事情。他曾不止一次地同高尔基谈到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距离。他说：“我们全是很厉害的发明家！我也是一样的。我们写作的时候，会突然对一个人物起怜悯心，于是就给他添上一点好的性格，为了使他不致显得比别人坏”

这就是说，艺术的真实是高于生活的真实的。艺术家可以根据自己美学理想对生活进行集中概括的典型化的描写，他可以使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更美好，丑恶的东西更丑恶。人民是严格要求艺术的真实的；但人民要求的艺术真实，并不是照相式的真实，而是经过作家加工改造过的真实。

安娜与托尔斯泰开玩笑

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里雅那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一位客人，同托尔斯泰谈起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客人说：“您的《安娜·卡列尼娜》，是非常感人的！但是您使她最后卧轨自杀，却未免对待她过于残忍了。”

托尔斯泰看了看这位客人，然后笑着回答说：“您的这个意见不禁使我想起了普希金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普希金对他的一个朋友说：‘你想想看，达吉雅娜跟我开了多大的玩笑。她结婚了，我万万没料到她会这样。’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她也是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她卧轨自杀了，我万万没有料到她会这样。一般说来，我的男女主角们，有时跟我开的那种玩笑，我简直不大喜欢！”

客人听了感到不好理解，便问托尔斯泰：“您说的话，我不大明白，能否再解释一下呢？”

托尔斯泰接着说：“不难理解，作品中的人物做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做的，他们的行为是现实生活中常有的，不是我愿意或者不愿意能够决定的。”客人听了点点头。

托尔斯泰在这里说出了现实生活对于作品的规定性。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有他们自身的发展逻辑。安娜·卡列尼娜的性格发展到最后必定自杀，这是符合生活发展逻辑的；如果她不自杀，反倒是不真实的。同样的道理，法捷耶夫《毁灭》里的美谛克这个人物，其性格发展到最后不该自杀，如果他自杀了反而不符合生活的发展逻辑；法捷耶夫改变了原来把他写成自杀的结局，更好地揭示了这个高度个人利己主义者的本性。事实说明，一个作家只有按照生活的发展逻辑去把握人物的性格，才能创造出成功的典型；如果随便改变生活发展所规定了的人物性格，一定会破坏典型的创造。

世界上许多伟大作家，都特别注意把握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例如：

屠格涅夫在创造《父与子》里巴扎洛夫这个形象时，是很少与人们来往的。他一个人隐居在自己的领地上，躺在一间小屋子里精心地构思着写作着，生怕外人之来破坏了原来构思的性格的发展。他一边写一边记着日记：“倘使我遇着一个有趣味的人，或者发生了一件重大的政治或社会的事件，我就依据巴扎洛夫的观点把这些事情全记在那本日记里。”他这时的思想，与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是一致的。

福楼拜在给乔治·桑的一封信里说：“我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应该是科学的、客观的。努力设想自己处于小说中人物的地位，这是必要的，但是不能使小说的人物来迁就自己。无论如何，在创作方法上应该是这样。”不让小说中的人物迁就自己，说得多么好哇！那就应该按照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去创造。福楼拜在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里创造爱玛·包法利夫人的性格时，就是按照生活的规定性，真实地刻画了她的形象，从而无情地揭示了她所生活的环境的全部真实。尽管当时有人以有伤风化来控告他，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现实主义立场。他说：“就在此刻，同时在二十个村庄中，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在那里忍受痛苦和伤心饮泣。”

生活规定着人物的发展，作家创造人物必须符合生活的真实。人物性格的发展改变着作家原来构思中的不合逻辑的成分，看来似乎是在开玩笑，实际上是创作过程中的正常规律。

我注重的是才能

俄罗斯伟大的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自幼就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青年时期就显出了他的文学才华。

杜勃罗留波夫生长在一个牧师的家里，由于母亲的教育，他三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克雷洛夫的寓言了，五岁开始认字，八岁就开始学习宗教史、拉丁语和俄文文法等一些科目了。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经常在父母面前提出“为什么？”“怎么回事？”“怎么样？”之类的问题。到了中学，读书就成了他最大的爱好，他所读的书数量是十分惊人的，光是1849年一年，他就读了400多种。他读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莎士比亚、狄更斯等作家的作品。他不光是读，还要思索。他曾在一首诗里这样写道：

啊，我是多么希望拥有这样的才能，
在一天里把这个图书馆里的书读完。
啊，我是多么希望具有巨大的记忆力，
要使一切我所写过的东西，终生都不遗忘。
啊，我是多么希望拥有这样的财富，
能够替自己买下这所有的书籍。
啊，我是多么希望赋有这样巨大的智慧，
要把书本中所写的一切东西都传达给别人。
啊，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变成这样聪明，
使我也能够写出同样的作品……

像他自己所向往的那样，杜勃罗留波夫很快就开始了自己的写作。开始时他写诗，模仿莱蒙托夫等人的笔调歌颂“春天”、“春晓”、“夏晚”，抒发自己的希望和胸怀。不久，他就开始了文学评论的写作。后来，他进了彼得堡的师范大学。就在他考入师范大学的第二年，母亲、父亲相继去世。于是，他这位18岁的长子就开始成了一家之主。父亲留给他的，除了在盖房时所欠下的一大笔债款以外，还有七个幼小的弟妹，生活是非常困苦的。为了求学，他不得不把弟妹们分散到亲友们家里抚养。但是由于有的亲戚本身的困难，或者有的虽然环境较好但却不十分注意，弟妹时常闹病，有的夭亡了。这些，严重地刺激着他的心，他自己在学校一点办法也没有。有时连寄一封信的钱都没有。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也没有间断过自己的创作，一些论文陆续发表了，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引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注意。

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正与涅克拉索夫一起编辑出版《现代人》杂志。有一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翻阅群众的来稿，突然发现其中有一份青年学生的来稿；他读了以后很是赞赏，一看作者原来是彼得堡师范大学的学生，19岁的尼古拉·杜勃罗留波夫，便决定请他到编辑部来谈话。第二天一早，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穿着一件普通上衣、带着惶恐和喜悦的心情的年轻人来到了编辑部，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看就认出他是杜勃罗留波夫。这一天，两个人谈得非常投合，一直谈到午夜三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我要知道，您的见解是不是符合《现代人》的方向；现在我看出来了，您是完全适合的。我要告诉涅克拉索夫，您就要成为杂志的经常撰稿人了。”杜勃罗留波夫走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向涅克拉索夫介绍了这位青年作者，涅克拉索夫也非常

赏识他的才能。

不久，杜勃罗留波夫从师范学院毕业了。涅克拉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决定邀请吸收这位年轻的作家来参加编辑工作，并毫不踌躇地把杂志的批评栏的领导工作交给了他。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对他说：“要写什么就写什么，要写多少就写多少，您自己就会知道。用不着向您多说的。”

涅克拉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这位青年作家的重视，引起了当时一些名作家的不满。有的人说：“这样一个重要的杂志，怎么能让一位刚从学校大门出来的年轻人担当呢？”有的说：“我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论文的时候，他的黄嘴丫子还没有退呢！”有的则干脆到编辑部来责问涅克拉索夫：“怎么把中学生也请来当批评家了？”可是涅克拉索夫对于这些说法并不赞成，他坚定地回答说：“我注重的是才能，不是资历！”

“我注重的是才能，不是资历！”这种思想是很可贵的。

墨水瓶怎么能吃呢

1895年12月，列宁和其他一些革命同志被捕了，关在彼得堡的监狱里。列宁在这所监狱里足足呆了14个月。

列宁被关在一间又狭小又肮脏的单人牢房。里面黑洞洞的，只有高处一个小小的窗口可以透进一点微弱的光。地上放有一张铁床，还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此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有的人处在这样境遇里可能会整天的愁闷和痛苦，可是列宁却整天在工作。

列宁决定要写一本书。怎么办呢？监狱里只准看书不准写书，而且写书也没有纸张，没有铅笔，更没有钢笔和墨水——什么都没有！有一天，他正站在那里思索这件事，家里人送书来了。他把书本拿到手里，突然想起来了：就往这本书上写不是很好吗！但是又想：不行！监狱里规定在书还给家人的时候要做详细的检查，如果发现书里有字，就要把书籍烧掉，这不就等于没有写吗？

想着想着，他一下想出了办法：用牛奶写！因为牛奶写在书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当你要读它的时候，把书往灯上或者蜡烛上一烤，那用牛奶写的字就现出了茶色，所写的文章也就清楚了。

找到了办法，列宁就装起病来，因为病人是要供应一点牛奶的。看守见列宁病了，便答应供给列宁一点牛奶。牛奶送来了，他就用笔沾着牛奶往书本上写起来。他在书本的天地空白处写；天地空白写完了，就在字里行间的白地上写。家里人知道了他在书上写作，所以在把书籍取回来的时候，就把每一页都放在灯上烤，然后把它誊写下来。

这样的创作是必须非常小心的。因为一不小心被看守发现，就不再把你当病人看待了，这样，不但牛奶要停发，而且还要受到狠狠的责罚。那时候，看守的监视是非常勤的，他们经常从门上的小窗口往里看，看犯人在做些什么。为了遮住看守的眼睛，列宁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把一个面包的当心儿抠一个圆坑，当成一个小墨水瓶；把牛奶往里一倒，就可以用钢笔蘸着来写作了。

有一次，看守悄悄地走到牢房门前，从小窗口往里一看。只见列宁正在写字。

看守立即把门一推，走进房里厉声厉色地说：“这下子可抓住你了！你

在写东西？”

列宁说：“没有墨水怎么写！”说着，他就把那个用面包做的墨水瓶放到嘴里吃起来。

看守一看，果然是面包。心想：大概是自己看错了！墨水瓶怎么能吃呢？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慢慢地走出去了。等他走远了的时候，列宁立刻用面包另做了一个墨水瓶，又继续写起来。以后，每当看守走来的时候，列宁都是很镇静地拿起“墨水瓶”往嘴里一放就吃掉了，而且吃得很香，因为那实在是牛奶加面包呀！

列宁就是用这种办法，在监狱里写出一部重要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后来，列宁出狱啦。朋友和同志们来看他，谈起这件事，列宁笑着说：“有一次我倒霉了，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就吃了六个墨水瓶。”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列宁与《生命的歌》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在哥尔克村的一所医院里度过的。

这时候，病情在一天一天地恶化着，可是他却在为革命而顽强地工作着、学习着。他躺在床上也好，在外散步也好，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人类最美好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身体稍好一些，他就要口授一些重要的文章，让秘书记录下来；就是在身体难以支持的情况下，他也要别人来读小说给自己听。当时，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经常在他身边，读小说似乎成了她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

太阳下山了，夜幕降临了。列宁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克鲁普斯卡娅开始朗诵起诗歌小说来。读谢德林，读高尔基的《我的大学》，读别德内依……在克鲁普斯卡娅朗读声中，列宁慢慢地睡去了。

在列宁逝世前几天的一个晚上，他忽然对克鲁普斯卡娅说：“请读杰克·伦敦的《生命的歌》。”于是克鲁普斯卡娅就把《生命的歌》找来读给他听。

《生命的歌》写的是：一个饿得快要死去的病人要通过一个荒无人迹的雪地，到一条大河的码头去。他已经是非常衰弱，肚子里一点食物也没有了。他连站都站不起来了，只能在地上爬着走。正在这时，后面来了一只狼。这只狼也是很多天没有寻到食物了，也快要饿死了。狼看见了人便拼命地追，这人见狼在后面追就拼命地向前爬。狼在后面追，人在前面爬，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搏斗，人终于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人已经近于半死了。

列宁听了这篇小说，心里非常高兴，脸上时时现出微笑。第二天晚上，列宁还是让克鲁普斯卡娅来读杰克·伦敦的小说。可是第二天读的这篇小说比起《生命的歌》就不如了，里面渗透着一些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小说里写的是：一个船长答应老板把船上所装的粮食以最高的价格卖出去，而他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竟然把自己的生命都送掉了。列宁一边听着一边笑，然后便挥了一下手。克鲁普斯卡娅知道列宁是不愿意听了，便停止了朗读。

1924年1月21日，列宁早晨醒来觉得身上很不舒服，也不想吃东西。经过医护人员的再三要求，他才勉强吃了一点，然后就躺下休息了。实际上，

这时他的呼吸已经很沉重也很不规则了。忽然，他向克鲁普斯卡娅说：“请给我读《生命的歌》。”还和上次一样，克鲁普斯卡娅拿起《生命的歌》慢慢地读起来：

晚秋的晴天气仍然继续，他于是继续爬，继续晕，辗转不停地爬；而那头狼也始终跟在他后面，不断地咳嗽和喘气。他的膝盖已经和他的脚一样鲜血淋漓，尽管他撕下了身上的衬衫来垫膝盖，他背后的苔藓和岩石上仍然留下了一路血迹。有一次，他回头看见病狼正饿得发慌地舐着他的血迹，他不由得清清楚楚地看出了自己可能遭到的结局——除非——除非他干掉这只狼。于是，一幕从来没有演出过的残酷的求生悲剧就开始了——病人一路爬着，病狼一路跛着，两个生灵就这样在荒原里拖着垂死的躯壳，相互猎取着对方的生命。

听着听着，列宁渐渐地闭上了眼睛，心脏突然永远停止了跳动。生命的赞歌是那样的有力，它一直随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直到他停止了呼吸。

一本非常及时的书

在高尔基和列宁的友谊中，1907年他们的第二次会面是极为重要的。

1907年，苏俄共产党在英国的伦敦召开了第五次党的代表大会。高尔基以一个享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列宁与高尔基关于《母亲》的一次谈话是无产阶级文艺史上光辉而又动人的一页。

列宁光着秃顶，用喉音卷着俄语的“P”音，两手交叉地插在腋下，很洒脱地站着。高尔基仔细地望着他，因为高尔基是一个文学工作者，职业本身已经养成了他注意琐细事情的习惯。高尔基面对列宁结实而又强壮的身躯，感到“这个人太朴实了”，似乎没有丝毫领袖的风度。

这时，格·瓦·普列汉诺夫来了。通过引见，他与高尔基相识了。列宁仍然是双手交叉在胸前挺立着。他似乎有点厌烦地看着高尔基，好像一个对于自己的职务感到厌倦的教师看着一个新来的学生一样。不大一会儿，列宁向高尔基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的应酬话：“我对您的才能是很敬仰的。”后来高尔基回忆说，除此之外，他不曾说过一句令他难忘的话。

又过了一会儿，列宁一只手摸着他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另一只手握高尔基的手，亲切地闪动着他的一双灵活得惊人的眼睛，一下子谈到《母亲》这本书上来。这时候，高尔基才知道列宁已经从伊·彼·拉迪日尼科夫那里看过了小说《母亲》的手稿。高尔基说：“这本书是很匆忙地写出来的。”但是还没有等高尔基说出为什么匆忙的原因时，列宁就肯定地点了点头。列宁接着说：“你赶写得很好，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是一本必需的书。很多工人都是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一定会得到很大的益处。”

列宁还郑重其事地问高尔基：“《母亲》是否译成了外国文，俄国和美国的检查机关把这本书删改了多少，……”当他知道了高尔基因此而被通缉的时候，便发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大笑。

这一次与列宁的会见，高尔基终生难忘。列宁所说的“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在高尔基看来是对自己的极其珍贵的赞语。因为它说出了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思想，即文艺要跟上时代的发展，要及时反映时代历史的

新场面。列宁的这种思想，在他写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一文中也有所阐述。他写道：“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列宁之所以高度称赞高尔基的作品，就是因为高尔基的作品及时地反映了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在《母亲》写作之后第四年，即1910年，高尔基又写了《海燕之歌》，作品描写了俄国正在发生着的革命风暴的图画，并预见将有更大的革命风暴来临，及时地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列宁看了非常高兴，并在他写的《在大风暴之前》一文中引用了高尔基《海燕之歌》中的预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文艺要及时地反映时代的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非常强调的一个思想。

古希腊的三大悲剧作家及时地反映了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变，反映了从野蛮到文明的深刻变化。革命导师马克思“每年都要重读一遍埃斯库罗斯的希腊原文作品”，他把埃斯库罗斯剧中普洛米修斯形象看成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并且写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恩格斯也非常喜欢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伟大的著作中，恩格斯一再引用其中的悲剧说明问题。例如悲剧《奥勒斯提雅》，恩格斯认为它是“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英雄时代’而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底戏剧式的描写”。

莎士比亚的戏剧反映了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社会历史的重大变化，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时代精神，可以说也是“非常及时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喜欢莎士比亚，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全家都非常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的三个女儿都能背诵莎士比亚的作品。马克思把莎士比亚和埃斯库罗斯当做“人类两个最伟大的戏剧天才”来热爱他们。他曾专门研究过莎士比亚的著作，甚至连莎士比亚剧作中最不惹人注意的人物都很熟悉。1870年以后，当马克思使自己的英语知识达到完美的境地时，曾把莎士比亚特殊风格的词句摘录出来加以分类，可见他对于莎士比亚重视到了何等程度。

19世纪上半叶，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导师看到欧仁·苏等作家的作品及时地反映了时代的某些变化时便大加赞赏。恩格斯称这种现象是欧洲小说领域中的“一个彻底的革命”，称这些作家是“时代的旗帜”（《论艺术》336页）。毛泽东同志也非常强调作家要写出非常及时的书，及时地反映时代的变化。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从亭子间来到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因为从上海的亭子间到陕北的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时代不同了，“周围的人物”、“宣传的对象”不同了，这时如果文艺工作者不能及时表现这种变化了的时代，不能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而是仍然在那里去写群众已经听厌了的老故事，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那他的工作就会脱离革命、脱离群众，脱离时代赋予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而像高尔基那样写出“非常及时的书”，乃是革命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今天，中国的历史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像高尔基那样，写出“非常及时的书”，及时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化。

“一定要等革命以后再写”

老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开始过的是农民的劳动生活。他精力充沛、聪明能干，能够一个人打退三个强盗，能够独自一人拿着一支猎枪出去打熊；乌丽亚娜·巴依玛科娃只有同他在一起，才感觉到自己是幸福的。但是慢慢地，他用自己积聚起来的钱造了一个工厂，开始由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变成了剥削他人劳动的资产者。事业使他变成了奴役别人的人，也逐渐地从他身上夺去了人的品质。但是尽管如此，作为劳动者的本质，在他身上还没有完全丧失殆尽。

他的第二代，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的儿子们，由于父亲的遗产，开始还保有一些人性的东西。他们参加着一定的劳动，和父亲一起出去打猎……但是，随着工厂事业的发展，他们的一点好品质逐渐衰退下去。彼得由一个沉静而又善良的幻想着黄金般的田野的年轻人，变得迟钝发胖起来，最后变成了一个贪婪、罪恶、酗酒、淫褻的魔鬼；他的妻子娜达丽亚结婚时是朴素而又温和的，但是当手里逐渐拿到了钱的时候就变得严厉起来，眼睛里放出一种肉欲的表情；二儿子尼基塔开始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小伙子，但是资本的发展使他变得污秽而又卑鄙……

到了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的第三代——孙子们，他们一生下来就把自己变成了平庸无用的人。彼得的儿子耶可夫过着无思想的、寄生的、枯燥无味的生活，他追求的是贪婪的、舒服的、无忧虑的平静享受。阿尔达莫诺夫一家就这样完蛋了。

这就是高尔基的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事》里所描写的一个资本家三代人蜕化的历史。

这部小说的构思开始于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前。

1902年的某一天，高尔基把自己看到的一个商人家庭的三代人的历史对托尔斯泰讲了。高尔基说：“在这一段历史里面，退化的法则特别无情地起了作用。”

列夫·托尔斯泰听了以后非常兴奋。他拉着高尔基的袖子说：“这倒是真的！我知道这个，在图拉有两家人是像这样的。应当把它描写出来，可以简简单单地写成一部大的长篇小说，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一定的！”托尔斯泰说话的时候，眼睛发出闪闪的亮光。

高尔基接着说：“可是这样又会写出些武士来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列夫·托尔斯泰接着说：“不要管它！这是很有益的事情！那个为了好替全家祷告而出家修道的人，的确是了不起的！这是真实的！你们犯罪，我却为了解除你们的罪孽祷告。还有另外的一个人，那个讨厌生活爱财如命的兴家立业的人，也是真实的！他爱喝酒，他是个粗暴的人，是个荡子，他对大家都爱，可是他突然间杀了人。啊，这真好！应当写这个，要在小偷和讨饭的人中间去找英雄是不行的，的确是不行的。所谓英雄，这是谎话，是发明出来的东西，只有平常的人，再没有别的了。”

列夫·托尔斯泰的这些鼓励和他所提供的素材，更加坚定了高尔基要写出这一家人的历史的决心。

后来，有一次高尔基见到了列宁。他在谈话中向列宁说出了自己的写作计划。列宁非常赞成这个题材，但又十分中肯地提了一点意见。列宁说：

“极好的主题，当然是很难的，需要很多时间，我想，你能胜任这个工作，但不知道您怎样结尾？现实还没有给予结尾。不行，这个一定要等革命以后再写。”

“一定要等革命以后再写”。列宁为什么提出这个意见呢？因为他认为：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俄国资本主义的矛盾；只有解决了现实存在着的矛盾，才能使作家看到事物发展的结局。所以他劝高尔基，在革命对现实的发展提出解答的时候再写。

高尔基遵照了列宁的意见，在历史决定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时，即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八年以后，写了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事》。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生活对文学有着规定性。在生活没有显示出事物发展的结局时，作家等一等再写是符合唯物主义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根据生活的逻辑推断出未来的事物，也不反对在作品里写出这种科学的预见性。

一次特殊的比赛

19世纪初叶，俄罗斯作家高尔基曾长时期旅居在意大利。有一次，他在那不勒斯一家饭馆里，和另外两位作家安德烈耶夫、布宁遇到一起了。这时的高尔基，已经是一位写出散文《海燕》和反映工人运动的巨著《母亲》的著名作家了；安德烈耶夫、布宁当时也都在文坛上露了头角，有了影响。因此，他们除了谈些生活问题以外，也谈了不少写作的问题。

三个人谈得非常高兴。这时候，不知是谁提出了一种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游戏比赛。比赛规定：当看见一个人走进饭馆的时候，每个人在三分钟内都要对他进行一次观察和分析，然后再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看看谁的观察准确而又说得对。

做了规定之后，三个人都面向饭馆的门坐着，聚精会神地等待着进来的客人。不一会儿，一位顾客匆匆走了进来，三人的目光一下子都射到了他身上。三分钟过去了，该轮到每个人说出自己结论的时候了。

高尔基说：“他是一位脸色苍白的人，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西服，还长着一双又细又长的发红的手。”

安德烈耶夫根本没有看清这个人是个什么相貌，连西服的颜色都没有看得出来，所以他只是胡诌乱诌了一通，说得驴唇不对马嘴。

布宁观察很细。他说：“他是一位身上穿着灰色西服的高个子。脖子上扎着一根带小花点的领带，长长的胳膊、红红的手，手上的小指的指甲有点缺陷，露在外面的身上长着一个小小的瘰子。”说完之后，他还下了一个结论，说这个人是一个国际骗子。

听了布宁的叙述，高尔基和安德烈耶夫都赞扬他观察得清楚，描绘得细致。但是对他的判断，却有点怀疑。正好这时候，饭馆的一个伙计走了出来，三个人便上前去把他请到跟前来，问他：“请您告诉我们，方才进来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这个伙计看看三位作家之后说：“这个吗，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他经常出现在那不勒斯的街头，名声很坏。”布宁的判断虽然没有得到确凿的证实，但却是基本符合的，高尔基和安德烈耶夫都很佩服。

文学要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必须对客观世界有一个仔细地观察。布宁之所以能把那个人的外貌说得那么清楚，就是因为他观察得仔细。观察的能